

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

林震

(莆田学院 教务处,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标志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和长达38年的“戒严”独裁统治是台湾民主化的特殊背景。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经济上和阶级上做好了民主化的准备,祖国大陆和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也影响了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在决定台湾民主化启动的诸因素中,晚年的蒋经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是民主化的“第一推手”。“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是台湾民主化的导火线,促使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下了最后决心。

关键词:台湾民主化 蒋经国 “第一推手” 导火线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2-0054-06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于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1],同时,“行政院长”俞国华发布命令,宣布“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从15日起开始施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台湾“解严”。台湾地区“解严”,标志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①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这是战后台湾政治发展的重大课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台湾学者田弘茂认为,台湾40年的发展,在6个方面形成了有利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1)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推动党外运动,敦促当局减低威权控制;(2)民间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私人财富及自主财源,可以超越党国控制范围去资助举办各类活动;(3)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议题导向的团体和职业团体逐渐增多,中产阶级普遍富裕;(4)大众传播媒体爆发式的剧增,言论尺度逐渐放宽,日趋自由化;(5)蒋经国为首的革新派,一直相信改革和民主化是必要的而且无法避免的;(6)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强调政治民主是党的终极目标,这使国民党在推动民主化时有了合理化的根据”。因此,“台湾的政治命题根本上不在于中华民国是否应该走上民主,所争议的只是民主化的速度与时间表而已”^[2]。大陆学者李松林则认为,蒋经国晚年主动推

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原因是:①企图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②谋求身后政权的“长治久安”;③企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所谓“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台湾模式”同大陆进行“和平竞争”^[3]。

这些观点给我们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动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还不够全面,有些观点我们也无法苟同(如田弘茂总结的“有利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之第五和第六)。本文拟从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民主化启动的导火线等方面,从微观政治层面探讨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复杂动因,期能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1987年以后台湾政治局势的发展。

一、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

台湾民主化有独特的历史背景。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接收了台湾,台湾结束了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悲惨历史。台湾回归祖国后,陈仪主持的行政长官公署,虽然“力求振作”,但是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内战,对于台湾这块新收复的土地,“不惟不能多予以资本与原料之补给,以助长台湾产业之恢复发展,反以种种征取,以造成台湾经济之贫血,与产业之凋敝”,同时,内地来台人员水准不齐,

收稿日期:2004-12-16

作者简介:林震(1971—),男,福建莆田人,讲师,博士,从事台湾问题和东亚政治现代化研究。

①朱高正认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应该在1986年5月。1986年3月底,蒋经国指定了12位国民党中常委组成了“政治革新小组”,研究“解严”、开放“党禁”等政治革新议题。5月中旬,小组开始工作,同时,在蒋经国的直接授意下,国民党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出席了与党外人士的沟通会,希望劝说党外人士放弃在开放“党禁”之前组党的计划,这是国民党来台后第一次公开地和反对派坐下来协商政治议题。这次沟通是台湾民主化进程启动的标志。笔者认为,从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力来看,将这次沟通视为“拉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较为准确。笔者采访前“立法委员”朱高正先生(中国统一联盟总部,新生南路,台北市),2002年5月9日。

部分公务员贪污失职,能力浅薄,使台湾人“致渐以往日日人指中国官吏无一不贪污、无一不饭桶之蜚语为正确”^[4],对国民政府“遂于热烈希望之余,而渐为怀疑,渐为失望,终至轻视,以日人不若视之,而发生离心倾向”。1947年2月28日查缉私烟事件引爆了台湾社会的不满情绪,事态进一步失控,国民政府派兵登陆台湾进行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国民党政府治台措施不当在前,滥用武力镇压在后,要为事件中中国人的同族相残负总责。“二二八事件”之后,南京监察院派遣杨亮功为闽台监察使,到台调查事件起因。在杨亮功撰写的《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中,他建议国民党政府,今后治理台湾,要“使其一方(面)趋于民主坦途,一方(面)使完全与祖国一元化而不至增加台湾对中央之离心力。”^[5]国民党政府没有采纳杨亮功的建议,反而将台湾当作打内战的资源补给地,继续进行独裁统治。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宣布台湾为“军事管制区”,处于“动员戡乱时期”,并以此为借口颁行“戒严法”,建立起独裁的“戒严体制”,对台湾社会实行严密控制和无情统治。但是,武力平息“二二八事件”,38年的“戒严”独裁统治,这些都平息不了台湾社会要求当家作主的强烈意愿。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强大意愿凝聚成的力量已经发展成对国民党政府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迫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通过民主化改革向台湾人全面开放政治权力。

经济和社会背景方面。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到80年代中叶,台湾社会已经呈现出迥然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风貌。以1950年和1987年比较,人均所得从100美元增到4991美元;^[2]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饮食花费从占收入一半以上降至不到1/3,人们将省下的钱转移到教育、旅游、健康保险和娱乐上;城镇人口从不到一半增加到近90%。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入70年代,经济富裕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1968年开始推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台湾人的教育水准,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中产阶级(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专业技术、管理、佐理、买卖等非体力性行业的群体)。1975~1980年,台湾中产阶级数量剧增,到80年代中叶,中产阶级已经占到了台湾总人口的20%~30%。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国民党和反对派都声称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从比例上看,中产阶级中有80%以

上的人支持执政当局,20%对政府和执政党有意见。但是,从影响力看,20%的力量却是关键性的,因为其中有许多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活动力,而80%中的大部分是被动的、沉默的。^[5]从总的政治倾向分析,台湾中产阶级对于既有体制大都不倾向去做激烈的挑战,他们是有条件、有保留的“求变者”,^[6]不满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不公平现状,要求重新分配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分享政治权力。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是蒋经国决定推行渐进式的“政治革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内部因素之一 晚年的蒋经国是启动民主化的“第一推手”

战后台湾经济现代化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功,被誉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特别是1983年以后,台湾的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都超过预期的8%的目标,外汇储备直线上升。国民党借助经济上的成功,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导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权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变革(transformation)型”的特点^①。蒋经国作为台湾岛内第一号威权统治者,在发挥“带头作用”、“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时候,他的“革新理论”、政治性格乃至身体健康状况,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民主化启动的时间、方式和特点。可以说,晚年的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进程启动的“第一推手”。

首先,蒋经国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革新理论”。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建立并巩固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最高政治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身上。蒋介石的意图是父传子。在父亲的苦心栽培下,蒋经国在台湾政坛逐渐巩固权力,直至全面掌控政局。1978年3月,蒋经国以98%的得票率被“国民大会”选为“中华民国第六届总统”,达到了权力生涯的最高峰,这时候,蒋经国是国民党主席、“总统”、“三军统帅”,全面掌控了党政军和情治单位,取代蒋介石成为台湾的第一强人。分析蒋经国1972年~1986年的执政活动,蒋经国在晚年启动“政治革新”虽然是迫于内外形势,但确实不是仓促的应景之举,他有一套自己的“革新理论”,包括:革新哲学、革新原则、革新方法和革新目的。

第一,革新哲学。①“有所为,有所不为,知所变,知所不变”^[7]。蒋经国说:“世事在变,局势在变,潮流也在变”,因此,工作方法上要“求新求变”^[7]不变的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不变,推动民主宪政的诚心

①所谓“变革型”民主化,指的是在变革过程中,威权统治者在结束威权政治、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变革转型要求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因此只是在政府控制着针对反对派的最终强制手段的牢固的军政权下或是威权体制经济上极其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变革。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54页。

不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决心不变^[8];坚决不和共匪谈判,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8];本党的主义和基本政策(反共复国)不变^[7];现行的宪政体制(包括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在内)不可变^[7]。变和不变的关系是 不论是有所变、有所不变,或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出于至诚,本于大公,以巩固国家民族利益为先,以增进国民大众福祉为重”^[9]。②“过程论”革新只是过程,是来达到‘复国建国’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一切作为,必须要为重建大陆树立范式”^[10]。第二,革新目的。帮助人民在法治的基础上,享有并行行使‘宪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7]革新是‘瓦解共产制度’的最有力武器,因此,“革新的终极目标是实行民主于全中国”^[7]。第三,革新的最高原则。“确保国家安全和宪政体制”^[10],即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第四,革新的方法。强调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法治,反对盲目乱动和轻举妄动,要求党内外“在安定中来求进步”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改革的步子一定不断前进,但为了确保改革的成果,也一定要走稳”。^[7]

从这套‘革新理论’中,是否可以得出蒋经国‘一直相信改革和民主化是必要’的结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①蒋经国的‘革新哲学’中,不变的多而具体,(其中有许多是该变的,比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谈判”;“现行的宪政体制”),可变的少而抽象。这样的革新观自然无法适应改革的需要,导致改革步伐缓慢,遭到了反对势力的批评;②蒋经国确实曾经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场合反复宣称‘实施民主宪政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国策’^[11]和‘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目标——实行民主政治’^[12]之类的话。但是,与此同时,他继续强

调‘我们今天是在戡乱阶段’^[8],不是完全的平常时期,企图用‘共党的威胁’和‘反共复国大业’来约束民主化的进程;③再把时间往前推,蒋介石和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标榜‘三民主义宪政和自由’,却在台湾推行了长达 38 年的最不民主的‘戒严法’和‘动员戡乱体制’^[1];蒋经国反复说要‘实施民主宪政’;在 1986 年前却始终没有公开提出民主转型的时间表。

尽管如此,蒋经国‘革新理论’还是有顺应民主化变动的进步一面,“革新理论”中值得肯定的基本内容是强调‘求新求变’,主张渐进式改革。在这种理论的主导下,晚年的蒋经国头脑比较清醒、思想也不僵化,愿意接受现实。80 年代台湾岛内最大的政治现实是‘党外势力’^[2]的活动逐渐活跃,它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压力在逐渐加大。70 年代后期‘党外’正式崛起。“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3]之后,“党外”一度消沉。到 80 年代初,“党外”势力再度崛起,以‘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准政党的组织形式进行政治活动。1986 年 9 月 28 日,在朱高正的提议下^[4],“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提前宣布成立。“党外”组党,给国民党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悍然镇压,国民党将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不镇压,“党禁”不攻自破,“戒严体制”将无法运转。面对台湾政坛的风云激变,蒋经国敏锐地察觉到,“世事在变,局势在变,潮流也在变”,^[7]“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已经行不通了,主动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开放,国民党还有继续执政的可能,否则,被民众革命推翻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就是前车之鉴。

其次,蒋经国的政治性格有蒋介石的言传身教^[5],但也有自己的特性^[6]。①对于重大的决策,在绸缪既定之后,完全不动声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于

①朱高正在‘立法院’发言指出,戒严时期,在台湾,只要有人对国民党的统治秩序提出质疑,就用‘惩治叛乱条例’加以处罚,且动辄是十年、二十年的徒刑,因此而积累下五千多件的政治案件,涉案人数八千多人。参见《立法院公报》,75 卷 85 期,第 28 页。

②“党外”是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政治反对派的泛称。所谓‘党外分子’是指“一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透过议会选举或创办杂志取得一个发言的地方后,根据执政党自己所参与制订且不断声言要维护贯彻的宪法,要求政府取消一切临时措施,迅速落实民主法治”。参见 江炳伦《民主与发展——江炳伦时论(一)》,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86 年,第 214 页。

③“中坜事件”:国民党去台后所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1977 年 11 月 19 日,台湾当局举行‘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时,参加桃园县中坜镇投票的选民,对国民党当局用金钱收买、警察干涉等手段控制选票,以保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的舞弊行为极为不满。在部分‘党外人士’带头下,上万群众包围了中坜镇‘警察分局’,当场烧毁 8 辆警车、60 辆双轮摩托车。国民党出动‘镇暴队’,向选民开枪射击,打死 1 名大学生和 1 名工人。选民们盛怒之下,放火焚烧了中坜‘警察分局’。④“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发起的反对国民党专制、要求民主的政治性事件。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组织 2 万多人集会,并在晚上举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导致流血冲突,有近 200 人受伤。这一事件被称为‘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之后,台湾当局收捕事件参与者,共 152 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美丽岛》杂志被查封。1980 年,经过所谓‘军法审判’,大多数被捕人员被判刑入狱。

④笔者.前‘立法委员’朱高正先生访谈录(中国统一联盟总部,新生南路,台北市).2002-05-09。

⑤1972 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写了‘逆水行舟’四字给儿子,并说:“你想要达成你的任务,必须要坚决、坚强、坚定”。蒋经国对此心领神会,将其概括成‘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政治生活中加以运用。参见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蒋经国先生全集》(第 12 册),第 549 页。

⑥蒋经国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仕途历练对其政治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蒋经国在苏联十二年,当过学生、工人、技术员和厂长,回国后,从基层到中央,从团到党,从内政到外交,经历全面,斗争经验丰富。到台湾后,在蒋介石的刻意培养下,步步高升,先后打倒了政敌吴国桢、孙立人,实行特务统治对付政治反对派,直至最后登上权力的顶峰。参见江南《蒋经国传》,前卫出版社,台北,1998 年,第 29—377 页。

短期内集中展布,以收水到渠成之效”^[13] ②要有效运用权力必须令人又敬又怕,也就是说,在错综复杂的政坛,行事风格要精明、无情、强硬;③为了维持权力的占有,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政敌;^①④刚柔并济,对属下赏罚分明,并且绝不让属下营造个人政治势力;⑤重视官员道德水准的提高。由此判断,蒋经国是一位行事独断、权力欲极强的马基雅弗利型的政治领袖。他不是民主型的政治领袖,但是,“乾纲独断”之下,既无军人政变和“宫廷政变”之虞,也避免了保守势力对决策的干扰,这使蒋经国成为从威权迈向民主的过渡阶段的理想领袖。

最后,蒋经国健康状况的恶化,使他产生了“来日无多”的紧迫感。从1972年(62岁)接任“行政院长”以后,蒋经国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1982年至1983年,蒋经国的身体明显衰退,病情(糖尿病)日益加重,医疗小组唯一的办法是使用胰岛素,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后来改用中医,再辅之以气功,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到1987年,蒋经国的糖尿病加重,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14] 蒋经国自己意识到,不抓紧时间开启革新之路,在他身后台湾必将陷入混乱。

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从1986年初开始,蒋经国有意识地加紧了改革的步伐,对岛内反对派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宽容。蒋经国转变威权心态的典型表现是默许“党外组党”。面对“党外人士”越来越明显的组党活动,国民党内有人主张采取高压措施强行压制,蒋经国不同意,5月7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指示,授权中央政策委员“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15],希望能以沟通阻止“党外”的组党活动。在民进党“抢先偷跑”成立之后,蒋经国于10月7日、8日和15日连续发表了三次谈话^②。在这三次谈话中,蒋经国虽然没有公开表态支持组党,甚至引用反对组党人士的理由(没有提到“国家名称”,没有提到“反共政策”),但是,他反对镇压组党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这直接决定了民进党的命运。

三、外部因素:大陆和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

祖国大陆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对国民党的“戒

严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78年,祖国大陆政府改变了“武力解放”的对台政策,标志着海峡两岸从“武装对峙”时期进入“和平对峙”时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进行两党谈判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同年元月30日,邓小平访美时表示,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表示“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5]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概括叶剑英提出的“九条”,大陆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正式形成。民间方面,廖承志以私人身份给老朋友蒋经国写了一封信,劝蒋经国“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廖信中引用了一句唐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6],情真意切,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大陆人民希望早日统一中国的迫切心情。蒋经国把这些统统斥为“统战阴谋”,但无法消除其对国民党“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的瓦解作用。针对“三不”政策,台湾民间出现了“新三不”,即对国民党顽固僵化的“三不”政策“不讨论、不研究、不认同”,以此来表达民间社会的不满。此外,在“反攻大陆”早已成为政治梦呓的情况下,大陆也不再把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首位政策选择了,所谓的“动员戡乱”更加显得荒诞不稽。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1971年“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顺应这些变动,美国政府改变了原有的对台政策,不再支持国民党以“反攻大陆”为理由维持独裁统治,而是推行以“民主、人权”取代“反共”的“冷战新思维”,敦促国民党“实现台湾的民主化”。在对国民党施压方面,美国国会议员充当了急先锋。他们组织“台湾民主促进会”,在国会发声,要求台湾不要拖延民主政治的推行;一些议员还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人权条款”^③为依据,以尊重台湾人人权为借口,

①1953年,经常指责蒋经国滥用权力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与夫人在日月潭险被暗杀,事后,吴不得不远走美国,从此不再回台湾;1955年,反对蒋经国利用特务干政的亲美派孙立人将军被蒋经国以“企图叛乱”罪名软禁,一关就是三十年;1979年“美丽岛事件”,蒋原拟判处反对派首领施明德死刑,后在余纪忠等人的反对之下才改判徒刑。

②三次谈话是:10月7日接受《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的采访;8日和1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周会上的发言。

③《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C项规定:“本法中任何规定,在人权方面都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特别是有关大约一千八百万台湾居民的人权方面。本法案特重申维护与提高台湾所有人民的人权,为美国的目标”,这条规定是经过彭明敏等“台独分子”积极游说后,由亲“台独”的美国议员加上的。参见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54页。

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支持“台湾独立”,如参议员佩尔曾表示,“台湾应成为一个由台人自治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这虽非美国政府现行政策,但我希望最终会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17],这种言论使国民党忧心忡忡,担心若再坚持一党专政,美国人有可能会考虑“换马”;1982年,参议员肯尼迪等三十余位国会议员签署了声明,要求国民党尽快解除“戒严令”;1981年“陈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事件”,1985年台湾情治单位拘留美国洛杉矶华文报《国际日报》发行人李亚频,这些事件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这些案件举行听证会,推动形成决议,并用“停止军售”做威胁,迫使台湾当局接受美国的要求。特别是“江南案”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问题小委员会召开公听会,讨论是否发动“美国武器输出统制法修正条项”,使国民党大为紧张,同时,美国媒体指出“江南事件”的幕后与蒋的次子蒋孝武有关,这迫使蒋不得不在1985年两次发表声明,保证蒋家人不会再当“总统”,并在1986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为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以使美国人放心蒋经国不会在台湾搞“家天下”;1985年9月,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通过“223号提案”,要求台湾取消“戒严令”、开放党禁。美国国会是对国民党的批评,形成了要求台湾“解除戒严”的压力^①,令国民党“极为难堪”^[18]。国民党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都必须依赖美国,必须尽力对美国朝野推销台湾比中国内地更为“自由”、“进步”的形象,因此,迫于美国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多次宣称要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四、内部因素：“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的发生成为民主化的导火线

最后促成蒋经国启动“政治革新”的导火线是“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

“江南命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正在撰写争议颇多的《蒋经国传》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旧金山近郊的寓所被人枪杀,经调查,是台湾情报局官员指使竹联帮分子行的凶。在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1985年4月将涉嫌此案的三名情报局官员判刑,但许多人认为还有后台老板,把矛头直指蒋经国本人。这个事件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狼狈不堪。

“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该社有17个分社,存款高达170亿新台币,是台湾历史

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1957年,蔡万春被选为十信理事主席,蔡家从此控制了“十信”。蔡家通过“十信”以高息违规揽储,然后投资于家族经营的国泰集团的企业,使国泰集团发展成为台湾的大财团。“十信弊案”的主角蔡辰洲(蔡万春之子)为了掩盖不法行为,长期以来利用送礼、安排职位、联姻等手段对国民党官员进行拉拢,建立了深厚的政界人脉,同时,还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身份,当选为“增额立委”。蔡家庞大的家族势力和社会关系网为蔡辰洲非法敛财提供了便利。1985年初,“十信”的库存已尽,无力支付高额利息,弊案被揭露,涉案金额多达110亿新台币,60多家企业和10万多人遭受损失。许多市民一生的积蓄转眼化为乌有,自杀人数上升。“十信弊案”造成台湾社会对政府严重的“信心危机”。

这两起事件从政治和经济上凸现了不民主的“戒严体制”的严重弊端。不管蒋经国有无介入“江南命案”,情治部门利用黑道到美国去暗杀一位美国公民,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慨,同时,此案暴露的情治机构权力过大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使蒋意识到必须从体制上削弱他们的权力。这个案件一方面损害了“断交”后的台美关系,蒋经国本人为此“慨叹中(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19];另一方面对台湾走向民主“起了微妙的促进作用”^[20]。“党外”利用“江南案”揭发国民党的腐败,争取了一定的民主空间。“十信弊案”揭露了政商勾结的黑幕,连“党国大老”、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也卷入其中,这对国民党一直提倡的“忠贞党员”的道德观是个极大的讽刺,民间社会普遍对国民党产生了“信心危机”。1985年3月,“立法委员”余陈月瑛在质询时指出,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民主宪政体制的不健全的总反应,是一党独大专政的弊端的总爆发”^[21],要求上任刚10个月的“行政院长”俞国华辞职以示负责。

为了抵消这两个事件对国民党“党国”的巨大冲击,重新收拢人心,蒋经国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定正式启动“政治革新”,拉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后,蒋经国指定了12位中常委(严家淦、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吴伯雄、邱创焕、谢东闵、李登辉,召集人先后为严家淦和李登辉)组成了“政治革新小组”,确定了六项议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

^①郝柏村认为,“美国的压力当然是有,比方美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他要求我们要解除戒严……”郝柏村《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34页。

化、革新党务、调整各项政策。小组从5月12日开始工作。六项议题中,“解严”是最为急迫的问题,“革新党务”是最根本的问题,蒋经国的想法是“以党的革新来带动行政的革新”、“以行政的革新来带动全面的革新”。从1986年5月到1987年7月,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党外组党”(1986年初~9月28日)和“立法院”中“国安法草案之争”(1987年1月5日~6月23日)的重大事件。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和俞国华“解除戒严”和以“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的宣布,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民主化时代。

对蒋的“革新”举措,国民党内的保守派竭力反对,他们甚至一批批地到慈湖蒋介石灵寝“哭诉”,请求蒋介石“显灵”,协助蒋经国“正确判断”,停止改革;^[22]党外势力虽然对蒋主动改革表示欢迎,但是认为速度太慢、力度不够。1986年和1987年两年中,蒋经国的生命开始倒计时,他以一介病躯,既要不断安抚党内反对的声音,又要对党外力量打拉结合“既要因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进行改革,又不能让党国的‘法统’和‘国策’受到损害,以‘向国家负责,向历史交代’,可谓心力交瘁,力不从心。

主观上,蒋经国希望这次改革能成为国民党来台后的第二次改造运动,给国民党带来新的活力,从而延续对台湾的统治,维持偏安局面。这使他发动的“政治革新”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保留:他始终坚持“反共复国”的所谓“国策”,虽然开放老兵到大陆探亲,但却做了许多不合情理的规定;改革信念不坚定。1987年12月31日,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认定民进党“阻碍立法、丑化司法,而有计划的打击行政的公信力与公权力”,准备动用军队来反对民进党,^[19]以维持蒋经国极为看重的“国家安全和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蒋经国可以改选“国会”,扩大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但不会同意“总统直接民选”^[19]。尽管如此,蒋经国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所采取的革新举措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拉开了台湾民主化的序幕,启动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使台湾向民主社会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中央日报社. 中央日报七十六年社论选集[C]. 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8. 255—257.

[2] 田弘茂. 大转型——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社会变迁[M]. 台北:时报文化,1989. 311—312, 41.

[3] 李松林. 蒋经国的台湾时代[M].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 172.

[4] 蒋永敬,李云汉,许师慎. 杨亮功先生年谱[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396, 403.

[5] 瞿海源. 泛滥与匮乏(长篇)[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127.

[6] 萧新煌. 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M]. 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90. 11.

[7]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5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236, 206, 206, 233, 226, 198, 232, 180.

[8]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20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83, 127, 49, 20.

[9]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3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96.

[10]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2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583, 582.

[11]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0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558.

[12]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先生全集(第14册)[C]. 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 258.

[13] 风云论坛编辑委员会. 蒋经国浮雕[M]. 台北:风云论坛社,1985. 202.

[14]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 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254.

[15] 叶九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EB/OL].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17887.htm>, 2003-05-08.

[16] 廖承志.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N]. 人民日报,1982-07-25.

[17]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Taiwan, Hearing, 97th Congress, 2d Session[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8.

[18] 漆高儒. 广角镜下的蒋经国[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269.

[19] 郝柏村. 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M].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 214, 394, 3.

[20] 陆铿. 江南不死(代序)——兼论蒋经国为什么要杀江南[A]. 江南. 蒋经国传[M]. 台北:前卫出版社,1998. 19.

[21] 立法院公报[Z]. 台北:“立法院”,1985, 74(23) 24.

[22] 许介麟. 战后台湾史记[M]. 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6. 503.